

重组、构建和联结：丹麦文学史研究新动向

Retooling, Composing and Connecting: New Trends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Danish Literature

何 畅 (He Chang)

内容摘要：安-玛丽·麦的新书《丹麦文学：1000-1900》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思想和利科的叙事学为理论框架，采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以散文和轶事式的叙述风格，将大量种类繁多又鲜为人知的文学文本和历史材料编织在一起，重现了众声喧哗中的丹麦文学史。在这一框架之内，有关作者及其作品的丰富信息互相对话，构成了彼此关联、意蕴深厚的网状历史叙述。该书不仅着力于展现丹麦文学在不同文学时期的成就与贡献，而且也力图彰显其跨媒介性、世界性，以及其性别维度和公共维度。除此之外，麦还致力于用重组、构建和联结的方式实践文学史创作，使其成为将作者、作品和时代联系起来的“流动”的文学史。该著作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为作者对丹麦文学独特性和世界性的深入讨论，以及对文学历史编撰学这一文体的突破性尝试。

关键词：《丹麦文学：1000-1900》；安-玛丽·麦；新历史主义；行动者网络；文学历史编撰学

作者简介：何畅，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

Title: Retooling, Composing and Connecting: New Trends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Danish Literature

Abstract: Withi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bining Bruno Latour's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Paul Ricœur's narratology, Anne-Marie Mai's new book *Danish Literature from 1000 to 1900* weaves together various literary text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at are little known to modern readers through her new-historic style of narration, aiming to recreate the history of Danish literature amid the heteroglossia. On the strength of this framework, the rich information about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is reorganized into a networked new-historical narration. Mai not only tries to demonstrate the contribution of Danish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literary periods, its features of inter-media and cosmopolitan writing, as well as its gender and public dimension, but also endeavors to describe a flow and connection

between authors, books and ages in a manner which features retooling, composing and connecting. The originality of this book mainly lies in the author's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uniqueness and cosmopolitanism of Danish literature and her breakthrough in her attempts to reconceptualize the genre of historiography.

Keywords: *Danish Literature from 1000 to 1900*; Anne-Marie Mai; New-historicism; Actor-Network Theory; historiography

Author: He Chang, Ph.D.,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rabbitc@hotmail.com).

丹麦文学是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版图上不乏像童话作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北欧莫里哀”霍尔堡（Ludvig Holberg）、“文化传教士”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彭托皮丹（Henrik Pontoppidan）、盖勒鲁普（Karl Adolph Gjellerup）和延森（Johannes Vilhelm Jensen）这些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师。近年来国际学界不断将目光投向丹麦文学，但关注点仍停留于个别知名作家，或局限于现、当代丹麦文学。因此，梳理丹麦文学的整体发展轨迹迫在眉睫。继米切尔（P. M. Mitchell）编著的《丹麦文学的群星》（*A History of Danish Literature*, 1971）、罗塞尔（Sven Hakon Rossel）编纂的《丹麦文学史》（*A History of Danish Literature*, 1992），及林高（Dan Ringgaard）和汤姆森（Mads Rosendahl Thomsen）主编的《作为世界文学的丹麦文学》（*Danish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2017）之后，杰出的丹麦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安-玛丽·麦（Anne-Marie Mai）的新书《丹麦文学：1000-1900》（*Danish Literature from 1000 to 1900*）为丹麦文学史的梳理，尤其是对其早期发展脉络的整理，作出了最新的贡献。

麦的新书《丹麦文学：1000-1900》视野开阔，别出机杼。纵览全书，作者以布鲁诺（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 Theory）思想和利科（Paul Ricœur）的叙事学为理论框架，采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以散文和轶事式的叙述风格，将大量种类繁多又鲜为人知的文学文本和历史材料编织在一起。在这一框架之内，有关作者及其作品的丰富信息互相对话，构成了彼此关联、意蕴深厚的网状历史叙述。该书虽以丹麦语文学为重点，但突破了狭隘的民族文学边界，以整个欧洲为背景进行跨民族和跨文化书写。可以说，该书不仅着力于展现丹麦文学在不同文学时期（包括前历史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和现代主义时期等）的成就与贡献，而且也力图展现其跨媒介性、世界性，以及它的性别维度和公共维度。除此之外，

麦致力于用“重组、构建和联结的方式实践文学史创作”（12）¹，使其成为将作者、作品和时代联系起来的“流动”文学史。因此，该书的创新之处不仅表现为作者对丹麦文学独特性和世界性的深入讨论，还体现在作者对文学历史编撰学（*historiography*）这一文体的突破性尝试之中。

一、多元与互释：众声喧哗中的丹麦文学史

安-玛丽·麦以纵向的文学史分期为经线，以具体的文学文本和历史语境为纬线，致力于描绘一幅众声喧哗，却又不失整体性的丹麦文学画卷。该书的整体性首先体现在作者的主题式分期方式之上。按照不同的主题，麦在时间纵轴上划分出三个历史阶段，从宏观层面连贯地呈现了丹麦文学在1000年至1900年之间的发展脉络。这三个阶段分别是“1000-1700：从神的时代到人的时代”（*from God's time to man's time*），“1700-1800：启蒙的世纪”（*the century of Enlightenment*）和“1800-1900：憧憬的世纪”（*the age of longings*）。具体而言，在第一阶段，神学和宗教文学逐渐被世俗文学取代，“人”成为被书写的对象；第二阶段见证了丹麦当代文学的兴起，这一趋势以席卷欧洲的启蒙文化对丹麦文学的深刻影响作为标志；第三阶段的主题则是“憧憬”：富于想象的丹麦当代主义文学既蕴含着对自由的超时空的憧憬，同时这股乐观情绪又被现实的挫败感和失落感所笼罩。这三个阶段都以“人”为主题——第一阶段紧扣“人”的诞生，第二阶段紧扣“人”的启蒙，而第三阶段则紧扣“人”的憧憬。三个阶段彼此呼应，互为关联，在流动的文学史中展现“具有历史感的人”。显而易见，麦所采纳的主题式分期方式有别于传统文学史的编纂方式。关于后者，韦勒克曾如此批判：“大多数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对那些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韦勒克 沃仁 292）。换言之，按传统方式编纂的文学史，或关注线性的历史，或堆砌、罗列文学作品，往往忽略了历史中的人及其发展的连续性。从这一视角来看，《丹麦文学：1000-1900》无疑跳出了这一窠臼，转向对人和文学的整体性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失为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文学史著作。

在上述纵轴之上，麦力图展示各时期内部不同文学思潮、文学概念的交织和互动，冲突和抵牾，以此呈现一部多元的、复数的丹麦文学史。以19世纪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为例。在作者看来，浪漫主义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复合的概念，它的边界“含糊”（*murky*）而难以被“程式化”（*schematic*）（145-149）。然而，如果因此就将这一时期简化成对欧伦施莱厄（*Adam Gottlob Oehlenschläger*）、斯蒂芬斯（*Henrik Steffens*）等个别文学巨擘的关注，那必将减损丹麦浪漫主义文学的整体生命力，进而导致读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from 1000 to 1900*,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22。下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者认知上的缺失。为了避免上述现象，麦带领读者回到了这段熠熠生辉的文学黄金时期，在抽丝剥茧的叙述中呈现了盘根错节、枝蔓横生的丹麦浪漫主义文学景观：在19世纪丹麦文学领域，感伤主义、德国浪漫主义、成长小说（Bildung-literature）、民族浪漫主义（national Romanticism）、彼得麦耶尔时期文学（Biedermeier literature）和激进浪漫主义（radical Romanticism）先后登场，它们或前赴后继，或协手共进，推动了丹麦浪漫主义文学的三次代际传承，并形塑了其内部的丰富肌理和层次。¹除此以外，在讨论18世纪丹麦文学时，麦还揭示了启蒙的拼贴性和多面性，以及古典主义在丹麦引发的多种文学趋势。可以说，《丹麦文学：1000-1900》是一部拒绝单一化和片面化叙事的复调式文学史。

在横向维度上，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的共时性互释同样凸显了麦对整体性的强调。根据新历史主义理论，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前景”与“背景”的关系，“文本的历史性”（historicity of texts）与“历史的文学性”（textuality of history）同举并重。²用作者的话来说，我们既能“以历史关照文学文本，也可用文学文本阐释历史”（8），文学研究的对象不能局限于狭义的文学文本，而应拓展至包含历史文献、文化符码等在内的广义文化文本。正因为如此，麦不时穿梭于文学文本与掌故、轶事之间，以广博的视野将散逸、孤立的众多材料重新编织成一副精妙绝伦而又引人入胜的文学全景图。例如，麦提到，中国读者熟知的丹麦作家安徒生在1867年深受牙疼困扰，随后他以此为素材创作了童话故事《牙痛姑妈》（“Tante Tandpine”，1872）³。读者读到此处，想必也忍俊不禁。另一个例子与17世纪的丹麦女作家勒奥诺拉·克里斯蒂娜（Leonora Christina）有关。克里斯蒂娜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女儿，国王死后，她作为政治犯被监禁了20余年。出狱后，她创作《回忆录》（*Jammers Minde*）记录狱中生活。读者历来认为，《回忆录》“令人信服”（78）地记录了克里斯蒂安四世过世后的丹麦政治权力斗争，但是麦却指出了该作品虚实相杂的文学特性。例如，克里斯蒂娜在自传中精心设计了夹杂低地德语、高地德语、法语、丹麦语的对话，将自己塑造成精通多门语言、善于外交斡旋的女政治家形象，而其政敌要么不懂外语，要么只会使用“简短的、磕磕巴巴的”（79）的丹麦语，难免相形见绌。不仅如此，她为了证明自己在狱中的健全心智，对外宣称这部作品大部分在监禁期间完成，从而巧妙地将现实中的斗争失利转化为“对政敌的精神和道德胜利”（80）。在麦的分析之下，这部《回忆录》既是引人入胜的文

1 See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from 1000 to 1900*,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22, 148.

2 参见陈榕：“新历史主义”，《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等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670-673页。

3 See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from 1000 to 1900*,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22, 141.

学虚构作品，又是克里斯蒂娜留待后人评判的史料。文本与历史层层交织，环环相扣，于无形中印证了雷蒙·威廉斯的观点，即艺术作品和历史不是互证关系，而是持续地相互塑造的关系（qtd. in Montrose 396）。

该书的整体性还体现在麦对边缘化声音的关注之上。以克里斯蒂娜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体是作者着墨较多的对象之一。如麦在前言所述，“与罗塞尔编纂的《丹麦文学史》相比，本书在对早期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介绍中均增加了更多女性作家”（10），从而有效地扩大了丹麦文学的疆界。以启蒙时期为例，麦突破性地将多萝西娅·比尔（Charlotta Dorothea Biehl）与霍尔堡、埃瓦尔（Johannes Ewald）等男性文学巨匠比肩，认为他/她们均通过书写参与了对公众的启蒙和对公共精神的塑造；同时麦又指出，女性读者极大地受益于这场文化运动，丹麦语剧院便是当时女性观众获得启蒙的重要场所。除了女性作家以外，在传统文学史中多被忽视的教师作家（school-teacher authors）群体也被纳入本书的研究范畴。正如陈榕所说，新历史主义“致力于恢复被主流话语所掩盖的边缘性声音和被主流历史忽视的边缘性文本”（680），而这显然也是麦编纂《丹麦文学：1000-1900》的重要意义所在。

《丹麦文学：1000-1900》展现了安-玛丽·麦深厚的文学底蕴和广阔的文学视野。她无意于以文学和文学家的冗长名单为历史作注。有鉴于此，她摒弃了法国古典主义批评家圣伯夫（Charles Sainte-Beuve）¹式的批评理念，选择了一种更注重历史内在纹理的新历史主义书写方式，力求在文学和历史的碰撞中呈现丹麦文学的多元面貌。实际上，这种历史书写方式也是一种“叙事”，具有形塑时间的功能。根据利科的观点，读者只有借助于叙事，才能经验性地理解抽象化的时间和发生在遥远历史中的种种事件。²简而言之，安-玛丽·麦以利科的叙事学为指导，通过充满感性经验和生命体悟的叙事来重现众声喧哗中的丹麦文学史，并激发起当代读者对丹麦文学多彩历史的热情。

二、联结与重塑：网状联结中的丹麦文学史

在《丹麦文学：1000-1900》一书中，安-玛丽·麦对文学史的描述呈现出独特的网状结构（network）。这种网状系统犹如欣欣向荣的树木，抽枝散叶，枝桠交错。而在这个联结不同时代的网络系统中，作者、读者、出版商、图书馆管理员、沟通者、研究人员，甚至空间、书籍和手稿，都犹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actor），跨越不同时空，彼此参照，交相辉映。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概念中，“行动者”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行动者”之间关系是不确定

1 圣伯夫是法国19世纪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以肖像式批评方法（oeuvre portraits）著称。他称自己是“为伟大人物画肖像的人，一个描绘性格的人。”参见刘晖，“从圣伯夫出发——普鲁斯特驳圣伯夫之考证”，《外国文学评论》1(2008): 5。

2 See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from 1000 to 1900*,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22, 9.

的，每一个行动者就是一个结点（knot），结点之间彼此平等，相互影响，并在相互关联中重塑彼此。深受拉图尔理论的启发，麦放弃了将历史装在“盒子”里的断代史研究方法，力图描绘出一种“流动”中的文学史。正是在流动中，作者、作品以及时代互相联结，彼此改变。也正是在上述流动中，历史本身在不同“行动者”的互相作用下，不断形塑并重塑自我。为了进一步说明其研究方法，作者引用了菲尔斯基（Rita Felski）在《批评的局限》（*Limits of Critique*, 2015）中的一段话：“文本拒绝被拘禁在容器中，它积极地跨越空间和时间，以既可预测又令人困惑的方式与其他因素相联系（……）文学文本不是博物馆展厅玻璃后静默的展品，而是在交流（流动）中积极活跃的参与者”（182）。在上述研究方法的指引下，该书在“流动”中展现了丹麦文学与欧洲其他国家、民族之间的联结，文本、建筑、音乐等媒介之间的联结，以及日益形成的公共领域中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联结。

丹麦文学的跨民族和跨文化特征由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语言环境形成。丹麦位于北海与波罗的海的交汇处，它南接德国，北近挪威，东临瑞典，是斯堪的纳维亚通向欧洲大陆的桥梁。其次，丹麦语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日耳曼语系北支，与挪威语、瑞典语非常接近，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几乎通行无阻。学者刘麟还指出，丹麦语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拉丁文以及希腊、德、荷、意、英等国的语汇”（刘麟 2）。因此，从最早的丹麦诗人萨克索（Saxo Grammaticus）到20世纪初的现代诗人克劳森（Sophus Claussen），丹麦文学体现出强烈的跨民族和跨文化写作的特点，而这一点也是《丹麦文学：1000-1900》一书的聚焦所在。从文学史评述到对单个作家的分析，麦始终强调丹麦文学创作是一种世界性写作（cosmopolitan writing）。例如，她指出第一代丹麦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实际上得益于英国、法国和德国启蒙文学的影响。具体来说，丹麦诗人埃瓦尔（Johannes Ewald）和巴格森（Jens Baggesen）都借鉴了英国作家斯特恩（Laurence Sterne）、杨格（Edward Young）、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德国感伤派诗人克洛卜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的创作手法和理念。¹而欧伦施莱厄的《黄金号角》（“The Golden Horns”）则得益于诗人和挪威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斯蒂芬斯（Henrich Steffens）长达16小时的对谈。有意思的是，斯蒂芬斯与德国浪漫主义思想渊源深厚。1802年，他在德国耶拿逗留时，与当时德国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费希特（Johanna Gottlieb Fichte）、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和歌德（Johanna Wolfgang von Goethe）都有来往，因此可以说，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借道”挪威，和挪威哲学思想一起成为丹麦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来源之一。在麦看来，这种文明与文化互鉴的传统与趋势造就了丹麦作家开阔的全球视野和世界公民的心态。尤其在19世纪中后期当丹麦步入全球

1 See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from 1000 to 1900*,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22, 145.

化进程以来，丹麦作家和他们笔下的人物、场景和主题都体现出强烈的“世界性”。例如，在戈尔施米特（M. A. Goldschmidt）享有盛誉的成长小说《无家可归》（*Homeless*）中，主人公奥托的成长与他在丹麦以及欧洲的自我放逐和游历不无关系。同样，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演讲、游记和为欧洲杂志所撰写的评论让他在欧洲获得了广泛声誉。一言以蔽之，丹麦的文学家“大都认为自己是国际文学共和国的成员”（菲·马·米切尔 82），因此，他们的创作是以那些不受国家局限的学者和读者为目标对象的。

对丹麦文学跨媒介特点的凸显也是《丹麦文学：1000-1900》一书创新所在。麦试图以跨媒介性研究（*inter-media*）为视角，用多媒介融合的方法展现立体的丹麦文学景观。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文本对象的跨媒介展现。比如，在讨论古丹麦文学时，作者指出，鲁纳铭文不仅出现在古代剑鞘上，还出现在石碑、船棺和碑书这些其他媒介之上，以符号的形式激发人们对那个魔幻时代的视觉记忆。作者尤其详细介绍了耶拿碑书（*the Jelling Stone*），它由两块符文石构成，形如一本打开的书，由公元十世纪的丹麦国王哈罗德·蓝牙王和其父亲在不同时代建立。在蓝牙王建的石碑上，铭文符号与狮形、蛇形图案交错、联结，述说着蓝牙王统一丹麦和挪威，并将丹麦带入基督教时代的丰功伟绩。麦还指出，古丹麦时代的这些鲁纳铭文往往具有音乐感，很多“有意使用了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韵律，词序，重复，头韵和常见于古日耳曼诗歌中的加重音”（27）。可见，在该作者笔下，鲁纳铭文是文字、符号、图像及音乐交织的文学形式。同样，在丹麦中世纪文学中，这种不同媒介间的互文性集中体现在教堂建筑、经文和羊皮卷手稿（*parchment*）中。例如，在公元1300年的《鲁尼法典》（*Codex Runicus*）中，鲁纳文、拉丁文和乐谱在羊皮卷中共同出现。该乐谱来自古代北欧民谣，大意为：“昨夜，真丝、织锦入梦来”（37）。真丝与织锦既代表世俗的享受，也代表柔软的触感。可以说，在长达101页的《鲁尼法典》中，文字、符号和乐符互相指涉，以视觉、听觉和触觉共存的方式再现了丹麦中世纪时期魔幻性、宗教性和世俗性交融的历史语境。又比如，受公元8世纪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的影响，丹麦教堂里的壁画通常以文字与绘画结合的方式来展现圣经故事。除此之外，流行于15世纪丹麦的图片圣经（*picture bible*）更是用木刻版画的形式来达到宗教启迪和伦理教诲的作用。在被称为《穷人圣经》（*Biblical Pauperum*）的木刻版画中，拉丁文经文、丹麦文释经和插画共同占据了页面，形成了图文并茂的效果。有鉴于此，麦称中世纪丹麦文学是“符号的世界”（51），并建议任何对中世纪丹麦文学感兴趣的人都不应忽视该时期的建筑、宗教仪式和视觉艺术形式。其二、对文学史的跨媒介展现。全书共有配图54张，照片内容包罗万象，大到文学家的雕塑、纪念碑、故居、博物馆、教堂、人文自然景观、戏剧的舞台呈现，小到棺木、乐谱字符、壁画、十字绣，甚至作家使用过的墨水瓶。这些档案、

文献以及遗迹照片以跨媒介的形式构建了利科所谓的“历史叙事”。利科认为，“历史叙事”可以连接固定不变的、直线的、具有客观性的宇宙时间和转瞬即逝的、流动的、具有主观性的经验时间。因此，这54张有关档案、文献以及遗迹的照片一方面再现了存在于确定、真实的宇宙时间之中的丹麦历史，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媒介复原了活生生的丹麦人在经验时间中留下的生活痕迹和生命印记。可以说，跨媒介视角中的历史叙事使该书成为一本有温度、有情感的文学史。

还值得一提的是，《丹麦文学：1000-1900》一书在构建文学史的同时，始终强调读者的在场以及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联结。在谈及丹麦18世纪启蒙作家霍尔堡（Ludvig Holberg）时，麦指出，如何培养具有阅读能力的“公众”，并形成自由交换意见的公共领域（public forum）是霍尔堡写作的目的所在。¹自1744年之后，霍尔堡开始仿效旨在改良社会道德的英国期刊《旁观者》（*The Spectator*），并发表了伦理哲学随笔集——《伦理观念》。事实上，除霍尔堡以外，丹麦作家斯尼佐尔夫（Jens Schielderup Sneedorff）创办的“品味俱乐部”（The Tasting Society）和丹麦语杂志《爱国的旁观者》（*The Patriotic Spectator*）都试图引领丹麦中产阶级读者的文学趣味，并以文学培育的形式重塑读者的伦理道德标准。应该说，对公众（publico）和公共领域的关注一方面彰显了丹麦作家对启蒙理性的向往，另一方面则充分体现了他们融入欧洲启蒙运动的意愿。麦认为，尤其在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执政之后，丹麦率先成为欧洲第一个获得出版自由的国家，并因此进一步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建构。²从1770-1772年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如英国作家艾迪生笔下的伦敦街头一样，咖啡馆林立，成为大小文人俱乐部的场所所在。正是在这些俱乐部中，丹麦作家针砭时弊，引领公共对话和讨论，培养了大量像黑贝尔格（P. A. Heiberg）这样的政治批评家。值得一提的是，麦在讨论丹麦文学与“公众”这一话题时，充分展现女性的存在。她谈到，受法国文化的影响，丹麦女性往往以举办沙龙的形式介入18世纪公共空间。这当中，尤以女诗人布伦（Friederike Brun）和拉贝克（Kamma Rahbek）的沙龙最为知名，正是在后者的沙龙中，外省青年安徒生在文人聚会首次出场。

综上所述，《丹麦文学：1000-1900》一书从未将文学文本视作静默的博物馆展品，相反，它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一部“网状”的文学史。安-玛丽·麦教授试图指出，正是在这些相关术语、作品、作家、地点以及社交网络的共同作用之下，丹麦文学得以滥觞，并在流动中不断构建并重塑自我。这种鲜

1 See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from 1000 to 1900*,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22, 107.

2 See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from 1000 to 1900*,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22, 114.

活生动又不失精确的文学史写作方式不免让人想起前文提到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后者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迄今仍是研究欧洲文学史的里程碑式著作。勃氏曾这样写道：“一本书，如果单纯从美学的观点看，它只是一件艺术品，是一个独自存在的完备的整体，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但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2）。和勃氏一样，麦以广阔的视野来审视丹麦文学，并使其总体性特征在各类术语、作品、作家、地点以及社会政治、宗教等因素的交汇和博弈中凸显出来。与此同时，她又以新历史主义的叙事方法，通过透视一个人物、一个时间点乃至一个时间段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丹麦文学：1000-1900》也为我们书写文学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Works Cited

-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Brandes, Georg. *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Zhang Daozhen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
- 陈榕：“新历史主义”，《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等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670-681页。
[Chen Rong. “New Historicism.” *Keywords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dited by Zhao Yifan et a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670-681.]
- Felski, Rita. *Limits of Critique*. Chicago: Chicago UP, 2015.
- 刘晖：“从圣伯夫出发——普鲁斯特驳圣伯夫之考证”，《外国文学评论》1（2008）：5-19。
[Liu Hui. “Starting from Sainte-Beuve: A Review of Marcel Proust's Critique of Sainte-Beuv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2008）：5-19.]
- 刘麟：“开放的文学，宽容的文学——中译本序”，《丹麦文学的群星》，菲·马·米切尔著，阮坤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
[Liu Lin. “Open Literature, Tolerant Literature: Preface to Chinese translation.” *A History of Danish Literature*. P. M. Mitchell. Translated by Ruan Kun et al.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13.]
- Mai, Anne-Marie. *Danish Literature from 1000 to 1900*,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P of Southern Denmark, 2022.
- 菲·马·米切尔：《丹麦文学的群星》，阮坤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
[Mitchell, P. M. *A History of Danish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Ruan Kun et al.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13.]
- Montrose, Louis.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ess, 2007.
-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Wellek, René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Liu Xiangyu et al.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ress, 2010.]